

中国模式的完善： 构建一个富有弹性的复合模式

王德忠^a, 董 杰^b

(四川师范大学 a. 经济与管理学院, b. 统战部, 成都 610068)

摘要:模式是不同方面与不同层次的制度之间有序组合形成的关系与合力,模式形成的合力越大,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越快。从未来发展来看,构建由经济模式、文化模式、社会模式、政治模式与生态模式有效统一的弹性复合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战略目标。基于改变“两垄断一勾结”市场结构的经济模式创新是中国模式完善的基础与前提,基于改变文化思维方式的文模式创新与基于内化公平即和谐理念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是中国模式完善的重中之重,基于适应科技发展与民众诉求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政治体制创新是中国模式完善的政治保障。

关键词:中国;模式;完善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3-0005-06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对此,有人用“中国模式”范畴加以概括,学界随之兴起了研究中国模式的热潮。目前,对“中国模式”存在乐观与悲观两种极端态度。认知中国模式,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需要以理智、冷静与客观的态度,对模式本质以及中国模式进行全面而又较为透彻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

一 对中国模式范畴的不同理解

对中国模式,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提模式有定型之嫌,甚至有输出国外之嫌,不如提道路、特色、案例、经验更为科学^[1]。显然,这些学者并不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有部分学者对中国模式从成功角度给予解读,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张维为,他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

经济与对外开放,充满了文化自信,并认为中华文明尤其是人口、地域、传统与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是“中国模式”特点的基础^{[2]98-113}。

还有部分学者从多维度反思中国模式,其中典型代表当属王辉耀^{[3]66-84}。他认为,中国模式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但一般主要研究经济模式,时间段局限于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模式具有明显特点,表现为政府强势与集中高效、对外开放学习与借鉴其它模式成功特质、不断修正的形式、较强的务实性与较快的适应能力、渐变发展过程与稳定国内局势、把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人口红利与出口导向型经济等;但中国模式也存在严峻挑战,如中国制造多中国创造少、人口红利多人才红利少、两极分化下的民众心理承受能力受到严峻挑战、能源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等。因此,中国模式需要学习、总结、调整与改造,并没有完全成形。

收稿日期:2012-03-10

作者简介:王德忠(1970—),男,重庆云阳人,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战略管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金融理论;

董杰(1963—),女,河南濮阳人,四川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党建思政。

企业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他们的声音具有阶层代表性。基于此,自2003年以来,笔者对“长三角”、“珠三角”与川渝等地企业界朋友进行了广泛调研。企业家普遍认为,中国模式的关键性特点在于市场机制的成功导入、民营经济的崛起、政府管制的放松以及政策的适应性变迁。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形成了改革开放是一国或一地经济发展的关键的“企业家共识”。多数企业家以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进行佐证,同时,他们也提出了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在危机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说明中国模式并不具有稳定性。部分企业家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式的温州模式不如政府主导的苏南模式更具有生命力,为此,他们以2011年温州多个民营企业“跑路”作为典型案例。但也有部分企业家并不认同此种观点,他们认为,苏南模式早已不复存在,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相互学习借鉴,已相互融合成为混合模式,混合模式正在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模式的主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阶层的人对中国模式特点的总结大同小异,但对中国模式可持续性的认识与认同度却大不相同。对此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很多^[4-8],在此不再赘述。

二 从模式特征探讨中国模式框架构建

深刻解读中国模式,还需要从模式解读开始。模式是外来语,在英语中即 pattern,从本质意义上讲,指的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或者说是对方法论的理论概括与升华。英国学者里奥·霍恩认为,“中国模式”这个说法至少有三种含意,即成功、可复制和周密计划^[9]。里奥·霍恩认为,三种含义就是模式的三个特征。但笔者认为,模式是不同方面与不同层次的制度之间有序组合形成的关系与合力,模式形成的合力越大,发展越快;模式形成的合力不衰减,则模式具有相对优势,一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也越具有可持续性。

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从哲学层面对模式特征进行了全面与全新探索,并把模式概括为如下特征:本质性、阶段性、针对性、层次性、时序性、弹性。这六个特征是模式之所以成为模式的基本要求,无论是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东南亚模式,还是中国模式等,无不具有上述特点。

按照以上模式特征的表述,对中国模式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从本质来看,“两力驱动”是既有中国模式的核心。模式的本质特征要求模式能概括出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规律的提示。如果模式未能将现象背后的规律提示清楚,这样的模式提炼显然不成熟。中国经济成功是结果,“两力驱动”则是原因。“两力”指的是行政力与市场力。行政力是政府之手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制度变迁导入市场机制,使市场主体自由选择、自主决策、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一旦市场主体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又倒逼政府深化改革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政府主要通过行政审批、土地流转、金融创新、人力配置、水电气管理以及通讯发展等制度改革,为市场主体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要素保障,实现了低成本发展。行政力一步一步地激发出市场活力,从而发挥了高效作用。行政力促进市场力,市场力反过来促进行政力,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点。这一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但更具有特殊性。普适性表现为市场力,而特殊性表现为行政力的理念、方法、程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一特色被称之为“强势政府”。

从本质来看,西方成功的核心也在于“两力驱动”,但是,中国由于现行制度等原因,政府往往采取强势介入方法,使行政之力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由于制度摩擦,产生了不公平、不公正甚至腐败等现象。但总体而言,由于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以至于出现了多年9%左右的经济增长奇观。

第二,从阶段性特征来看,既有中国模式是过去30年成功的经验总结与规律揭示,并不代表这一模式具有未来适应性。其实,不同阶段的模式,对应不同的前提条件,一旦前提条件变化,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模式具有历时性、阶段性与动态性特征。可以这样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是政府统一配置资源,主导一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为了搞活经济,政府通过行政力驱动市场力,激发了市场活力,政府作用相当强大。现实中,政府部门是事实上的强势部门。但前30年发展模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而且危害也越来越大。比如,权力寻租问题日益严重;不公平导致了两极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两极分化导致内需难以扩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困难重重;新旧政策引起的不公平,导致

上访不断,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国有企业垄断导致分配不均、资源使用部门化、效率缺失、创新不足且压抑民营经济发展;未受约束的工业化导致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极为严重;政策差异导致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等。

旧模式引发了新问题,而按照旧有模式,新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这势必需要构建新模式加以解决。因此,任何成功模式都有前置条件,当前置条件变化以后,需要创新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

第三,从针对性来看,既有中国模式主要针对“穷”字。模式具有针对性,每一种模式都要解决某一阶段的问题,而通常旧问题解决过后,又会引起新的问题。这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本身会引起新的问题产生,而旧模式根本无法解决自身引起的新问题。为了解决新问题,新模式自然应运而生,事物发展充满了辩证法。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落后,民穷国贫,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改革思路。一切为了发展,一切服务于发展,一切为了脱贫致富,这是前30年的发展方略。30年后,中国奇迹般地富起来了,虽然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人均GDP不足以支持这一说法,但是从纵向比较来看,国人幸福感、尊严感与自信感前所未有的,但亦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

虽然还需要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但今后几十年的中国模式针对的问题已不主要是“穷”字,而主要是解决由穷至富过程中的公平困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题。可以说,前30年是做大蛋糕的阶段,而今后几十年则是分好蛋糕,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与生态协调发展的阶段。针对的核心问题不一样,中国模式的重心亦应随之转移。

第四,从层次性来看,既有中国模式是先战略后战术。一般而言,模式有战略层面,也有战术层面。战略层面的模式决定着战术层面的模式,也就是格局决定一切。因此,不同层次的模式对于国家的影响力并不一致。既有中国模式从战略层面看,是确定市场改革目标,并坚定坚持这一目标;从战术层面讲,则实行双轨制,如价格双轨制、地区政策双轨制、商业模式多元化等等。虽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讲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事实上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市场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在具

体做法、具体措施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模式的最大成功就是反复采纳社会科学试验方法——试点,即建立试验区,反复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推广。从效果来看,这一经典做法则是中国控制改革风险的关键方法。

第五,从时序安排来看,既有中国模式采取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的改革路径。模式包括战略目标、战略定位、战略路径与战略举措,尤其是战略举措,由于内在联系,需要安排好时序,以防止制度短板造成的制度摩擦,以及因制度缺失形成的发展制约。因此,模式的路径设置与措施安排,一定要讲究时序的合理性或科学性。为此,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因为农民最穷,变革的意愿最强烈,农村发展变革的阻力最小;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放政策从特区做起,最为成功的深圳特区之所以成功,除了紧邻香港之外,还因为深圳偏于一隅,阻力最小。这是中国改革者的大智慧,也是改革模式设计者经验的体现,如果不从阻力最小环节做起,改革者很难驾驭复杂局面。

增量改革将促进存量改革模式的完善。改革初期,人人都是受益者,出现了帕累托效应。但随着利益集团的形成,存量改革阶段的帕累托效应消失,利益集团成为当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所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目前我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因此,既有中国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六,从弹性来看,既有中国模式具有充分的弹性。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弹性,适度的弹性对于模式而言至关重要。如果弹性过度,或者说过于富有弹性,则不具有稳定性,也就不成为定型的模式;但是如果过于刚性,弹性不足,则没有活力,僵化甚至僵死。因此,模式的适度弹性至关重要。中国既有模式的弹性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政策替代部分僵化的法律条文,使制度适应新的形势。如果该做法无法奏效,政府官员则可通过游说方法获得上级认可,促进制度创新,实现制度供给弹性化。正是弹性制度,使中国前30年的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弹性制度最大的危害在于制度的随意性,从而导致经常出现决策不科学、资金严重浪费等等问题,也为权力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总体而言,弹性制度功劳很大,即所谓制度不足,政策补;政策不足,创新补,这是既有中国模式成功极为重要的制度原因。

三 完善中国模式的策略思考

中国模式需要动态演进,需要防止出现固化趋势。但中国模式也存在自己的路径依赖,需要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上渐进化完善,以确保社会稳定。为此,笔者提出以下策略性对策。

(一)中国模式需要由经济模式向文化模式、社会模式、政治模式与生态模式有效统一的复合模式演进

中国30年改革的成功主要表现为经济改革成功,也有文化与政治模式的小幅度完善。社会模式的完善并不令人满意,与之高度相关的文化与政治模式的完善也没有经济模式令人瞩目。目前,经济模式日益表现出的缺陷多数源于社会、文化与政治模式的固有缺陷。因此,构建有弹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与生态有机统一的复合模式,是中国模式完善的战略方向。

有弹性的复合模式是一种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对既有以经济为核心的模式的完善,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与生态有机协调的成功模式的构建。新模式的形成,要遵循以经济模式为核心与起点,以社会管理模式与文化建设模式为重要延伸与创新,以生态模式为重要形态,以政治模式完善为终极依归的演化路径。该模式具有动态性和制度弹性,能应对各种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生态危机与政治危机;同时,能适应世界民主化潮流,能有效规避各种世界危机向国内蔓延而造成的较大损害,最终演化为活而不乱、治而不僵、富有弹性、繁荣和谐的富强社会。

(二)基于改变“两垄断一勾结”市场结构的经济模式创新是中国模式完善的基础与前提

要构建有弹性的复合模式,首先需要完善经济模式。目前,中国经济模式有诸多缺陷,首先表现为国有控股银行制度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过度扩张,形成了新型垄断。新型垄断最大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向各个领域的广泛延伸,从而对民营经济形成挤出效应。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国有控股银行垄断性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国有大型企业资金充沛,什么项目都可以做,都敢于做,缺乏风险意识。国有控股银行倾向于给国有企业放贷,是因为国有企业亏损有政府补亏,其风险小,甚至是零风险。地方政府也基于这一原因以及国有企业比较规范的特点,喜欢引进国有大型企业到本地发展,从而出现了国进民

退的现象。

市场结构方面,在地方出现了“两垄断一勾结”现象,即指国有大企业控制大型项目,国有控股大银行控制信贷,担保公司与之形成勾结,导致民营中小企业不得不接受非正规的高利贷,民营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威胁与挤压。这已导致中国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削弱,如果不进行控制,可能存在国民经济崩溃的危险。2011年,众多中小企业“跑路”原因很多,但“两垄断一勾结”的市场主体结构是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经济模式需要解决经济结构顺利转型的难题。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以及经济质量的全面改善,需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作为有效支撑。新型工业化要求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需要充足的环保技术与产业新技术,然而,这些技术极为短缺。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技术与管理创新,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而国家产业技术管理战略的全面更新,需要依赖社会、文化与政治模式的创新。

经济模式的完善要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建立新型城乡形态,以及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可以这样认为,经济模式的完善决定着生态模式的完善,为此,本文不再单独阐述生态模式完善路径。

改变“两垄断一勾结”的市场结构,促进产业技术更新战略,需要国家高层下决心反垄断:一是反行政原因导致的大型国有企业垄断,二是反国有控股银行对信贷资源的垄断,三是反官商一体对国家战略资源的垄断,四是反行政部门过度参与市场机制造成的市场垄断。同时,需要进行系统性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

(三)基于改变文化思维方式的文化模式创新与基于内化公平即和谐理念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是中国模式完善的重中之重

过去更多地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但随着国际潮流的发展,应该更加强调文化凝聚功能、国民素质提升功能以及创新功能,为社会管理与政治创新创造条件。要突出文化创新功能,创新功能是促进发展的根本所在,是一国长久繁荣的根本保证。促进文化的凝聚功能并不需要一味强调意识形态特色,尽管这是必要的,但必须适度。文化认同是文化凝聚功能的前提,文化认同需要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实现,采取一味说教的方式既不科学也难以产生好的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文化素质提升功能在于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为经济科学发展模式、社会公平化管理模式以及民主政治模式的完善提供必要的公民素质准备。因此,文化建设创新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必须符合世界潮流与国内发展大趋势。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表明,西方科技成就的80%左右受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但中国近现代没有取得西方那样的科技成就。为此,人们不禁反思产业革命与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在中国发生与完善的缘由。在探寻根源的过程中,学者们重点反思了文化,甚至反思了几千年文明约束下的思维方式,即中国重归纳法,不重视演绎法;重视文学化模糊语言表达,不重视准确化、数字化表达,反映出国人探索真知的勇气不足,影响了国人思考力、获取知识的思维方式与手段,从而也就大大制约了中国的科技创新力与管理创新力。尤其是顶层制度创新能力的弱化导致社会制度的固化,是制约社会自我调适能力的关键。破坏性历史事件的周期性发生深刻表明,中国一直试图打破历史周期规律,但文化模式导致的行为模式出现了无奈的惯性特征与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可见,中国文化创新的路还很漫长,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是现实需求所在,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尖锐矛盾需要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国家提出的以人为本与社会和谐,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终极目标,保证措施即保证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充分就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首要任务;教育高质量、城乡均衡发展、医疗资源高质量、城乡均衡分布、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全面有力、城乡居民住有好居等,是今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与难点。

显然,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强大的财力支撑,并需要进行系统化的改革才能实现。当前,从政府运作来看,把社会管理简单地等同于维稳,这是严重的管理误区。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社会控制,更不是简单维稳,而是基于居民利益诉求的合理解决,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管理,公正和谐的理念必须内化于社会管理创新模式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可以比资本主义实现更为发达基础上的高质量的社会公平。因此,社会管理机制重在构建快速的民生响应机制、切实的民利保障机制、及时的矛盾化解机制,

而不是不计成本的通过社会控制实现社会稳定和表象上的社会和谐。社会管理更不是管制,而是要对民意进行有效疏导。

当前,文化思维模式与公平化社会管理模式的完善,是中国模式完善的重中之重,是人民的重要关切,是社会和谐的基点,是中国持续、健康与平稳发展的关键与枢纽。

(四)基于适应科技发展与众诉求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政治制度创新是中国模式完善的政治保障

中国历代一直在努力追求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科学决策也就无从谈起;没有科学当然也就没有民主,民主需要通过科学化的制度与科学化的程序实现。当前,我国的科学与民主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如结束领导干部终生制,实行任期制;实行公务员逢进必考机制;强化纪委党内监督职能;强化检察院社会监督功能;实行部分差额选举、村干部公推直选等等。这些措施都表明了我国民主的进步。民主进步是带来经济成功的政治保障。正是政治上的进步,才使得我国执政党面临国内外复杂事件时富有弹性对策,并强有力地应对了一个个经济与政治风险以及自然大灾难。

总体而言,我国的科学与民主进步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同步。目前,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向纵深发展,拓展了民主监督的覆盖范围,提高了民主监督的及时性、有效性,加速了民主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使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与民主意识愈来愈强烈;国家经济发展基础与家庭民主化成长背景,更强化了新一代国民的科学与民主意识。我国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完全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进行系统化改革正当其时。

管理对象特征发生着深刻变化,要求政治制度进行适应性创新。可以这样认为,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将演变为制度竞争,制度重于一,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相互学习借鉴、进行组合创新是重要的改革路径。从改革的重点内容来看,执政党党内民主、执政党与其它党派之间的民主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使民主形式与内容更加契合。民主不是放任,监管是民主重要的实现形式。形成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有效监督体系,保证各种权利在规范下高效运行,保证民主渠道畅通有效,保证国家人、财、物合理高效配

置,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不因权力交替而出现大的经济波动与社会风险,这是我国政治模式需要完善的核心内容。

政治模式的弹性仍然是制度设计者需要表现专业性的重点领域,在和平时期,政治制度要有足够的民主性,并能通过有效程序而不是形式程序实现政治意志。在特别时期,如大的自然灾害、突发的外部与内部事件,要有足够的反应速度,形成快速的特大事件反应机制。和平时期的慢速度与非常时期的快速形成有效均衡,足以保持我国持续、快速与健康发展,保持我国充满持续的竞争力与足够的应变能力。

政治模式的完善需要自上而下,尤其需要顶层设计,甚至是超顶层设计。政治模式的完善涉及利益集团、利益调整,甚至牺牲部分利益,因此,改革与完善政治模式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主动性,同时符合大众的期待心理与承受心理,具有可控性,因此,改革更容易成功。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具有破坏性,甚至卷入利益集团的利益纷争,使改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四 结论

模式具有典型的示范性与样板性,同时它有实质性、阶段性、针对性、层次性、时序性与适度弹性。

适度的弹性,以灵活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是一国发展模式最为要紧的。在和平时期,模式要能真正保证它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在特别或非常时期,它要能迅速反应,以足够应付国内外突发事件。模式不能仅仅是经济模式。经济是基础,经济模式是核心,也是模式构建的起点与关键点。但当经济基础演变到一定的时候,旧模式的诉求减弱,旧模式引起的问题不能依靠它自身消化,而需要新模式逐渐替代旧模式。

正是模式的这种特点,表明中国模式在不断的演变中,完善是永恒的主题。经济模式演变到一定的时候,需要社会模式与文化模式的适应性变化,并与经济模式相匹配,形成有效的链合效应。当社会模式演变到有效解决了基本矛盾以后,文化模式的凝聚功能、创新功能以及提升全民素质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政治模式的完善就成为焦点与难点。政治模式的完善不能停止不前,相反,政治模式的完善必须与经济、社会、文化模式的日益完善相适应,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复合模式。显然,模式的完善本质是制度变迁,需要各种层面的制度变化与之协调。当前,打破“两垄断一勾结”的市场结构、改革文化思维方式、建立公平化社会管理机制,都指引着我国进行深层次政治体制改革,以构建并完善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模式。

参考文献:

- [1]冉文伟.“中国模式”研究综述[J].学会,2011,(3):59-63.
- [2]张维为.中国震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3]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M]//吴敬琏.中国未来三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4]赵宏.中国模式与世界主要发展模式比较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09,(4):30-34.
- [5]庄俊举,张西立.“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J].决策与信息,2009,(3):24-26.
- [6]杜平.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刻[N].联合早报(新加坡),2009-03-06.
- [7]亚历山大·力口布耶夫.中国模式他国无法复制[J].海外经济评论,2008,(48):31-32.
- [8]徐坚.“中国模式”面临国际认同问题[J].人民论坛,2009,(9):52-53.
- [9] Leo Horn-Phathanothai. 解构“中国模式”[J].海外经济评论,2008,(28):5-6.

[责任编辑:刘萍萍]